清代全史

第八卷

国防大学 2 063 7227 2

清代全史

第八卷

本卷主编 宓汝成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清代全史
·第八卷·
Qingdai Quanshi
本卷主编　郑汝成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337,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1/4　插页 5
印数：1,554—6,553
1993年10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　虹　丁建新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赵多良　责任校对：刘　涛

ISBN 7-205-02348-3/K·267
定价：17.00元

K207(4)/01

前　言

为了促进清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早在60年代初便酝酿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部大型清史。由于十年动乱被迫中止。十年动乱结束不久，这项工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前辈学者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年迈体弱，这项工作便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完成前辈未竟之业。

1983年以前曾设想组织全国各省市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力量，编写一部1000万字左右的清史，并按这个设想拟订了规划。经过反复讨论，鉴于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正在整理，专题研究还不够深入，修纂大型清史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规划一时难以实现。

1983年在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重新讨论了清史规划。这个规划的要点是，自1983年起到1990年，即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以8年的时间，完成一部10卷本的《清代全史》（当时暂名为《清代通史》）和大约20卷的《清代人物传稿》。

这部《清代全史》是纳入全国史学发展规划的项目，由国家资助研究经费。书中的观点，是我们探索性的学术见解。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目负责人邀请一些朋友，分别担任各卷主编，再由各卷主编聘请学术界同仁组成该卷的编写小组。第一卷主编李洵、薛虹，第二卷主编王戎笙，第三卷主编郭松义，第四卷主编王戎笙，第五卷主编韦庆远、叶显恩，第六卷主编张书松青、张小林，第七卷主编龙盛运，第八卷主编宋汝

成，第九卷主编徐彻、董守义，第十卷主编刘克祥。

本书不设总主编，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这是一个尝试。目的在于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有利于发挥撰稿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可以心情舒畅地一道工作。为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我们经常举行分卷主编会议，除了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重要学术问题。例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应付这种新形势的能力，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征，这些问题在分卷主编会议上都交换过意见。我们的写作过程，是互相学习、互相砥砺的过程，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编撰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因此，我们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同行们以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以出版《清史研究丛书》，享有盛誉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热心地接受本书的出版，并慷慨地给予出版资助。该社的袁闾琨编审、徐彻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由衷地感谢。我们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不吝指教。

王戎笙

1990年7月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由辽宁人民出版社资助出版。

本卷主编 宓汝成

本卷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克祥　房建昌

张照东　宓汝成

戴一峰

目　录

前言
绪论……1
第一章　国土开发和社会矛盾的激化……19
　第一节　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发展概况(上)——本部……20
　第二节　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发展概况(下)——边陲……33
　第三节　社会矛盾的急剧激化……63
第二章　通国被迫开放和特权让许……82
　第一节　破坏领土完整和强制中国开放……83
　第二节　摧毁传统外贸管理体制和强行设置外商活动条件……108
　第三节　中国近代海关的建置……122
　第四节　领事裁判权和停泊军舰……132
第三章　财政制度的演变……145
　第一节　巨额非常支出估计……145
　第二节　“银贵钱贱”的对策和赋税的核实筹划……151
　第三节　“借资民力”的悉索敝赋筹措岁入……172
　第四节　复辟旧制国策下的财政整顿……217
第四章　太平天国的理想社会和财经政策措施……241
　第一节　社会经济纲领……242
　第二节　社会经济理想体制及其实践和演变……250
　第三节　商业：政策和实际……279

第四节　军需国用和筹措财货的政策措施…… 299
第五章　战乱后的废墟和给予封建秩序的冲击…… 329
第一节　内战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330
第二节　封建秩序的全面冲击…… 364
第六章　清政府“自图振兴”国策的经济实践…… 370
第一节　维护地主产权的土地政策…… 370
第二节　增强封建统治的经济技术设施…… 408
后记…… 458

绪　论

清代从道光朝最后十年起经咸丰到同治末的35年（1840—1874），按《清代全史》总体规划，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本卷是以撰述这个阶段的政经社会并力图能够写出它的演变动态为主的一卷。卷中行文之作“本阶段”、“这个阶段”或“这个历史阶段”，除另有说明外，指的就是1840—1874年的这个阶段。

中国政经社会秩序在这个阶段动荡剧烈，变化巨大；到本阶段末，朝野有识人士已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如冯桂芬认为，“方今已非三代之天下”；李鸿章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历史现实表明，这个阶段在中国历史上，往远古说，是遥接春秋、战国之交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嬗变的又一重大历史变革的阶段；就近今说，它又是在中国产生“百年魔怪舞蹁跹”的开始年月。然则它又是怎么转变成这样的呢？下面就与本卷所述有所关联的问题，先试写四点。

一　当国执政者昧于国内外形势，治国乖方，使国家两失振兴机会

历史总是在变动不居中延续下来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关键年代、关键阶段，无论是转好还是转坏，经常出现在动荡剧烈的岁月。这样的岁月，一般说，既充满危机，又富含机会；作为危机会延续，作为机会每瞬息即逝。一个国家的前途，一个王朝的命运，究竟是遇危机而沉沦，还是抓住机会由

革新而振兴，就看当国执政者面对变局，能否善于应变、驭变、用变了；是否善于因革损益，制定出一个能够适应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本国根本利益的国策，倒不一定是成文的、系统的，而且有强有力的政治重心来实践。大清王朝在这个阶段的当国执政者的行事对上述问题作出的答案，却都是否定的。

中国在清代从乾隆末（18世纪末）起，“衰世”景象已经触摸可及。建立在工农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呈现衰落现象；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趋向加剧；社会上民众“生活不易”，“浮口”（即失业者）增多，流民增加；以及“盗风日炽”，民间抗租、抗粮斗争的频繁发生等等，在在传导出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已经到了难以再忍耐下去的讯息，也表明他们对既定的社会经济秩序，要求有所兴革、有所调整、有所突破的愿望。国家的外部环境也日益严峻着。明正德十年(1515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飘洋过海东来，登陆南海一小岛——屯门，标志着中国和西方行将结成一种新的联系的开端。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缓慢发展，到18世纪末，英国遣使中国，不单单要求通商，而且觊觎得一小岛。从这时起的1/4世纪里，它一再遣使相求，并屡以兵船游弋中国海上相恫吓、作威胁。在北边，俄国继其大肆东向开拓疆域起，不单早与中国疆域相邻接，而且屡有蚕食活动，骚扰边陲，进而图谋“假道”黑龙江。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在那时已经处于新起的世界强国所形成的南北夹峙或海陆窥伺的态势之中。

当年的全国政治重心在朝廷，在“乾纲独断”的皇帝手里。操此“乾纲”的无论是嘉庆帝还是道光帝的行事信条，是把“祖制”捧若禁物，“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不可破之例”。上行下效，“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恣

芒自逞者”（龚自珍语）。对内政，“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析言地方之利病”；一旦有事，“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已”（曾国藩语）。对外务，它既昧于世界形势的演变，一无了解还不屑于了解；由无知而自大，对“叩关”而来的新兴西方国家，仍视若“蛮夷”，“轻慢”之，“不加考究”（魏源语）；可又别无处置的长策。如对外国兵船侵犯领海情节，认定实属“不成事体”，但除了“晓喻”制止并严令各省堵截，便拿不出其他有效方策。所以，在道光中（19世纪30年代），忧国有识之士（如龚自珍），已痛切预言：“乱竟不远矣”；并仰空吁求：“我劝天公重抖擞”！

清政府在内政、外交两方面的政策措施两多失当，道光二十年（1840年）乃在西方挑起的对中国第一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中遭到败绩。清政府不能卫国保民，使自己的威信扫地；也使国家、民族深蒙凌辱。英国以其野蛮的，血火交织的暴力加诸中国，客观上却也为中国内部封建制度的解体和为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而发展，提供了一种推动力。关键在于怎么对待。中国人民之中就有因战败而震醒，明确意识到一个新的年代行将到来了；并认定中华民族为求生存发展，必须在观念上有所变革，不能再囿于成见陈识；行动上也该这样，不容再作茧自缚以求振兴了。当年魏源就是个中杰出代表。他忧心国是，于鸦片战争一结束，在所编撰的《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具有远瞻性的主张，并提出“善师四夷”论。这也就是说，他主张要放眼世界，首先得承认“夷”也有“长技”，其次，应该广泛地向凡有“长技”的无论哪个“夷”来学习；更重要的，则是必须“善师”。其潜在之意，就是自己要有点主意，应以本国的国情——精神的、物质的现状和潜力——为

本，向外国或西方作有效的学习，为中华文化增添新的血液，为中华民族增强潜力，以期不为“夷”“所制”而使祖国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能够取得与其文化、历史相称的尊严和地位。

可是，当权执政者却本末不分。他们于创深痛巨之余，理该痛定思奋以自赎，悉心倾听民间心声和谋国议论并引而发之；实际表现却全不是这样。他们既失去了大清朝初年努力吸取汉文化以补己不足的精神；更抛弃了际此场合在中国早已有之的“卧薪尝胆”的古训。他们既把《海国图志》弃若敝屣（它在东邻日本被视若宝书，一再翻印），而且对战争过后继续探索西方先进技术的行为呵斥为“糊涂之至”（道光帝朱批）。另一方面，举朝又把民族之耻的《江宁条约》当作真能保障“万年和平”的护符。掌权的仍是“无耻者多”，“知耻者少”（龚自珍语）。如此遇变不“惊”，还能说得上什么驭变、用变，把攸关清王朝存亡和国家命运的挑战，持作为振衰起敝的机会！？于是，机会错失了，危机延续着。

清王朝因袭苟且一、二十年，先受到太平天国为主的人民大起义的惩创，继又遭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中国再也不能自外于国际社会了；所谓“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畛界”。准备应变了！是该“变”了。而“世界的中国”该怎么自处？清王朝一出手便铸成大错。

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既打了败仗，一时被迫受屈妥协，倒不是一定不可作为策略的，贵在于更应该知耻、明耻，作出还我尊严的安排。而清王朝呢？如上所述，既把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接受的条约当作保障“万年和平”的护符，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窃喜外敌“志在贸易”并“无利我土地之心”，而甘心接受此时正在形成着的条约体制，并在其约束下

过生活。设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作为使中国半殖民化的标志，那么这也就是说：清政府竟愿接受“中国在世界”中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安排，而且准备使之处于这样的安排，即力求保持这样的所谓“和局”。

清政府把“中国在世界”中自我作了如上定位并取作前提，来重整大清朝的威信；认识到无论是为对内，还是对外，都必须“稍变祖宗之成法”，制定所谓“自图振兴”，或简作“自强”的国策。其最终目标，说是要“为国家奠万世不拔之基”。

要干这么一番宏伟的事业，没有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指导思想将寸步难行。从当权执政者中一部分人，即习称洋务派者在仓促投入“变”中的言论或行动中的体现、所形成的理念，以及用与之关系密切且具有影响的人物如冯桂芬所概括的话来说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也就是日后经衍变而概括成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简作“中体西用”取作了这个“变”的指导思想。

上述的“本”或“体”，具体言之，指的是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经济、社会、政治等等的基本制度；拟取以为用的“西学”或“术”，其内涵随着时日的演进而不断调整、增益着。就截止这一历史阶段之末说，主要指的是坚船、利炮、机器设备以及与之相关的最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他们颇为自负，也极自信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语）。为“自强”而“变”，就是本着这个主旨来展开。

中华文化历数千年绵延不绝而保有旺盛生命力，原与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向能容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充作自己的新

鲜血液有关。当年掌权执政者在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之处上，还硬划一条该学和不该学的界限。这既与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悖，也落后于当日开明人士的思想水平；如当年有人道："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冯桂芬语）。附带指出：约略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在派遣前往欧美考察的使节团给予指示："凡是可予我国有益之事，概当研究熟览，"以便结合自己的传统予以融合。试与比较，便相形见绌。这是说，"自强"的指导思想有失偏误。

"稍变祖宗成法"之"变"，从进入同治朝（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躁动起来；大举开展则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尔后又相继平定了其他义军等"动乱"，盲目陶醉于自己的"本"或"体"的有用性。它面对兵燹后的残破局面，力谋复辟，一切复辟旧制、旧状。只许把有助于加强、巩固这个"本"或"体"的西学，才能利"用"。

就本卷所涉及的国家经济基础说，清廷认定这是"本"中之"本"，无须"变"，也绝不能变。这样，当对战胜太平天国一具有了信心，便既不认真反思自己所以"致反"、"致抗"的根本原因，更不对以近亿计的生命和难以数计的资财为代价所换来的局面作出一些顺应形势的调整和变革，而是一意孤行，重建已成历史反动的封建土地制度，甚至对西学中的可"用"者，当有人提出调整农业经营方式，仿制农耕机器，引用先进器械技术等等也根本听不进去而严厉排斥。这样，不单把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又用强力复辟了起来，而且使地主土地所有制度下的小农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着统治的地位。

政治制度也是“本”，清廷也认为不能“变”，也不给“变”。有关联系君民之情的议论一概不听；惟亟亟于寻求强化国家机器之“术”，并急于“用”之。忠诚于王朝的一些权要，煞是郑重地提出他们所能提得出的并自认为最好的政治建议，着实为“整军经武”尽心竭力地做了一番工作，从而引进了在当年属于现代文明的某些科技产物，建置起一些物质技术设施。

国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首先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它本阶级利益的工具。清廷当国执政者在“自强”名义下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说是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实际表明只是以狭隘的王朝统治利益为出发点的。它所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和一些建设，当然对强化国家机器能起作用，一时确也起了不少的作用，以至一度出现所谓“中兴”的征象。可是，就对国家的独立、进步和发展而言，却不能这么说了。这点很重要。这是“中兴”终难久长，或者说“中兴”只是一时呈现的假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至于说“自强”名目下有所为的那些设施，对国家奠了“万年不拔之基”，如果不考虑本含有政治鼓动的含义，更是直同梦呓！

有道是：一个人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恩格斯语）。这一阶段“自图振兴”或“自强”名义下所进行的经济实践出乎执政者的“预期”，是势必、实际也正多少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以至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冲击。清朝这时的一代大政还能给人值得记忆的，也就是这些。

二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血火交织的暴力把中国推向准殖民地的行列

1815年，英国以在拿破仑战争中取得胜利为标志，在世界上站住了霸权的地位。它自恃其日益繁荣和兴盛的权势，在全球规模内以自己利益为中心，掀起在海外展拓领土的殖民新浪潮。在这个国策总原则下，它又因应其国内发展状况结合世界形势，并针对不同地区和国家，采取不同的殖民策略。约略相当于本卷叙述的年代，它正以“世界作坊”自豪，揣着“自由贸易”的旗子，遍跑世界，企图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尽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在可以施展殖民统治的国家（或地区），便横加占领，作为它的“海外领地”，或殖民地；但也渐转到并不一定认为拓置殖民地对英国为最有利的策略。1852年，英国政界权贵迪斯累里(B·Disraeli)说：“殖民地是吊在我们颈上的石磨”。他是一个“很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府要人”（列宁语），如此语句出自如此人物的口，显然不是在说英国准备非殖民地化了；而只意味着为了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并不一定以设置海外领地——殖民地为最有利。一切得看具体情况来作出具体的决策。

中国以其文化、历史的悠久和地理上的形胜地位，自从成为一个国家起，一直宛似一个世界地独自运转着。它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并且人民富有反抗精神，酷爱自由而不能忍受任何黑暗势力的侵略；但是，这个时候中国的统治机器，却是平庸的、软弱的而且是衰弱的。据此，英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难以征服，变成它的一个殖民地的国家；同时却又是一个容易被打败的国家——所谓“大清帝国这只大船必将沉落下去；它

的强和大，只不过表现于体积和表象”——而把中国视若自己的现成的牺牲品。

英国从它既定的世界战略出发，针对中国的情况，谋定打开中国的市场，能任如己意地来推销它的工业产品和搜刮中国的原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首先，英国鉴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等国对中国也有觊觎，但还欠缺实力，乃率先宣布自己的政策：“女王政府不想享有专有的对华贸易特权”，用此以求在采取行动时能够减少可能发生的阻力，并进而与之结成以自己为盟主的事实同盟，来共同增强对中国的压力。

其次，英国利用所拥有的军事优势，用战争手段占领它所要占领的地方；过后，又取舍由我地对曾占领的土地作番抉择，或实行永久占领，或立即撤兵，或定期撤兵以造它的政治威势。它对想占领并已占领的地方，不单不看成是吊在自己脖子上的“石磨”，反而捧作“女王王冠上的宝石”（香港），以显荣耀，以示大英帝国的存在，兼是对清政府显示政治威势。

其三，英国主要用战争手段、战争威胁，兼以政治讹诈或利诱，迫使清政府让予一系列的特权；继则在已经取得的特权的掩饰下，用实际行动进一步破坏中国的主权；尔后再用战争或战争威胁迫使清政府把非法破坏中国主权的实际行动合法化为条约特权。另一方面，它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默相支持，怂恿与清政府签订条约，追取新的特权；然后又以最惠国条款，共同分享从清政府追取的特权，从而使所有条约，构成体制，且日益苛细和严密化。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此体制为依据，既在中国取得了便利于商品侵略的各种特权，又在通商口岸，及后来名之曰“租界”的据点上无视中国法权，俨然以征服者、